

百卷本

名誉主编 张山年 李葆华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全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4

K2
2:3

88572

·精装合订本·



200205562

中国全史

第4卷

本卷书目

- 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
- 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史
- 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
- 中国春秋战国文学史
- 中国春秋战国艺术史

(每册均由彩页隔开)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室
★ 藏书 ★

责任编辑：刘丽华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卷本中国全史(合订精装 20 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

(百卷本《中国全史》丛书/史仲文，胡晓林主编)

ISBN 7-01-001456 6

I. 百

Ⅰ. ①史②胡

Ⅱ. 通史-中国

Ⅳ. K2

百卷本中国全史

BAIJUANBEN ZHONGGUO QUANSHI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商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93 插页 40

字数：15500 千字 印数：1--1000 册

定价：1138.00 元

宋镇豪 著

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

人民出版社

本卷提要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导民成俗”的人文育成，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着深层次的推陈改新，呈现出一幅异彩纷呈的历史场景。本书旨在把握文献及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再构这一历史流程中的社会生活习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获取其史识上的立体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生活形态的实貌。

DA173/04

目 录

中国春秋战国习俗史

| | |
|-------------------|----|
| 一、春秋战国习俗概述 | 1 |
| (一)时代特征 | 1 |
| (二)礼与习俗的分合 | 3 |
| 二、人与社会 | 9 |
| (一)习俗的社会育成氛围 | 9 |
| (二)城市民风 | 13 |
| (三)乡里俗观 | 20 |
| (四)畸形社会面影 | 26 |
| (五)私学与仕进 | 32 |
| (六)愤世疾俗的“穷通”之士 | 38 |
| 三、移风易俗 | 44 |
| (一)习俗的移易 | 44 |
| (二)部民齐俗 | 49 |
| (三)名事邑里 | 54 |
| (四)礼贤风气 | 60 |
| (五)导民以正恶俗 | 67 |
| 四、社交节仪俗尚 | 74 |
| (一)相见节仪 | 74 |
| (二)迎送节仪 | 78 |
| (三)跪拜节仪 | 84 |

| | |
|----------------|-----|
| (四)言行举止节仪 | 89 |
| 五、饮食习俗 | 97 |
| (一)消费生活观念 | 97 |
| (二)食馔与烹饪 | 106 |
| (三)粮食定量和定时就餐 | 114 |
| (四)宴以合好 | 118 |
| (五)进食节仪 | 124 |
| (六)名物辨用 | 130 |
| (七)乡饮酒 | 138 |
| 六、婚仪与婚俗 | 144 |
| (一)婚姻六礼 | 144 |
| (二)择偶观念 | 151 |
| (三)婚姻禁忌 | 160 |
| (四)婚制婚俗 | 166 |
| (五)多偶婚和生子观念 | 171 |
| 七、服饰习俗 | 180 |
| (一)服以旌礼和服饰俗尚 | 180 |
| (二)丧葬习俗中的丧仪和服制 | 190 |
| (三)服饰的地区性特色 | 199 |
| (四)仪容修度 | 210 |
| 八、信仰习俗 | 218 |
| (一)吉祀敬鬼神 | 218 |
| 1. 祭 祖 | 220 |
| 2. 祭 天 | 223 |
| 3. 社 祭 | 226 |
| (二)神灵信仰上的忌讳 | 230 |
| 九、结 语 | 239 |

一、春秋战国习俗概述

(一)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称“东周”，始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 770 年，又分为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时期。春秋时期得名于经传孔子编修鲁史《春秋》一书，是书记述史事，起自公元前 722 年，止于公元前 479 年，恰与一个客观历史发展时期约略相当。战国一名，乃取之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前时人语言中的所谓齐、楚、韩、魏、赵、燕、秦之“战国”七雄，史学界一般是把晋国的韩、魏、赵三家灭智伯而瓜分其地的公元前 453 那年，作为战国时期之始。年代起始如下：

| | | |
|----|-----------------|------|
| 春秋 | 公元前 770—前 454 年 | 东周时代 |
| 战国 | 公元前 453—前 221 年 | |

平王之前历代周王所统治中国的二百几十年中，立都主要在今陕西省长安县的宗周，史称西周王朝。当时的王权体制相当强大，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之说。周天子在直接治理的王畿区远近广大区域，建立分封殖民统治网

^① 《诗·小雅·北山》。

络,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又有一批在不同程度上服属于周王朝的部族方国。不过,到西周王朝晚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王权体制式微。幽王时,内忧外患增剧,西方少数民族犬戎,在申、缙等小国支持下,联合入侵宗周,杀幽王于骊山下,导致西周灭亡。其后,周太子宜臼幸得诸侯国相助,继立为周平王,东都成周洛邑,也即东周时代的由来。

平王东迁,王权名存实亡,进入诸侯力政、霸权迭兴的东周前半段春秋时期。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①。从此周王再无控制诸侯的力量,实际左右全国政局的,有所谓春秋五霸,具体确指,说法不一,最主要的当推鲁、齐、晋、秦、楚、宋、郑、吴、越等诸侯国,五霸即指其间代兴的一些国君^②。这一时期,与周室衰微一样,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在走下坡路,政权下移少数强大的卿大夫甚或卿大夫家臣即“陪臣”手里。用孔子的话说,平王东迁以前,基本上属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时代,以后则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以至于“陪臣执国命”时期^③。

战国时期,全国的分裂割据政局继续发展,列国间兼併吞灭,逐渐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均势并立局面。《战国策》叙录称当时“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五个千乘之国,别指鲁、卫、郑、宋、中山等五国,亦不过苟存于一时,终相继为强国吞并。这些国家,“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③ 《论语·季氏》。

守其国家，持其社稷”^①。后来七个万乘之国中的东方六雄，最终也灭于西北雄国秦。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长达五百余年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遂告结束。

春秋战国乱世，有“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礼从宜，使从俗”^②的人文育成，社会的大动荡带来的社会构成反复组合，使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着深层次的推陈改新。如浙江绍兴出土春秋晚期《徐尹鼎》铭云：“敬盟祀，纠建涂俗，以知恤辱”，可能是淮水流域徐人一支南迁附越后，申述要以故俗自承自律自新，说明战乱的人口流动，越地习俗引入了外来调节机制，可见当时形成的观念形态和处理方式上的随机应变“因民成俗”与社会的广纳开放性状。当时的社会习俗，一方面各地缘之间对固有旧貌的历史传承和发扬，同时则又每受社会变革与地缘间交往交流而融会交合，发生种种变异，从而展现出一幅异彩纷呈与凝塑内蕴的历史场景。

我们所要勾勒的，就是这一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习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进行宏、中、微观并具的探索，勾其外在表象而勒其内在规律，加强史识理解的立体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期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有个较全面系统、较客观如实的认识，获得一些察古鉴今的启迪。

（二）礼与习俗的分合

习俗是礼的本源，礼则为习俗的升化，广义的习俗也可容括

① 《淮南子·要略》。

② 《礼记·曲礼上》。

礼,习俗,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生活现象,文化属于生活的产物,习俗则为其最亲切自然的表达。中国古代本有“礼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大宰》:“礼俗以驭其民”,被放到与祭祀、禄位、刑赏等“国之大事”、“国之利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至春秋战国社会生活中,礼又返本于俗,以其特有机制,来调节伦际关系和等级关系,和谐人际间伦理情感,稳定社会秩序,维系上层社会的运作和平民社会的凝聚不散。《礼记·大传》说:“百志成故礼俗刑(型)”。礼见诸节文名物制度,化礼成俗,是为礼俗,复又受上层统治阶级倡导,下层民间渐惯成自然,如此演为—时代的习俗,这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固有的文化生活要征。

春秋战国的社会习俗,实包含着礼与俗两方面的分合内容。

礼指较固定的行为准则,包括行为外部表现的节仪及其中蕴含的思想,带有自觉与有意识的性质。时代的演进,礼也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内涵。原初的礼,“始诸饮食,其潘黍稷豚,汙尊而杯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①,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世代相继的本诸早先之俗而自然积成的行为观念模式和社会规范,其中敬鬼神节仪尤成为核心部分,故有云:“礼者,宾鬼神,考制度也”^②。但至春秋时,礼经人为理性化,上升为“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③的“国之大事”、“政之所成”^④,并据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⑤,从而被灌入了社会化的政治人文主义内容。到战国时,随着贵族世袭政治制度的全面瓦解,平民登庸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

① 《礼记·礼运》。

② 《礼记·礼运》。

③ 《左传》隐公十一年。

④ 《国语·鲁语》。

⑤ 《礼记·曲礼上》。

角色作用,礼又有了新的调整,《荀子·富国》核定:“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这种普及化、全民化、复杂化的内容焕然更新的礼,已具有规范大社会思想观念及崛起生活组成的性质功能,是充实社会结构新秩序、认同社会经济分配新形式及保障新兴统治集团权力运作的重要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外部表现节仪,有吉、凶、宾、军、嘉的所谓“五礼”^①。又有冠、婚、丧、祭、相见、乡饮酒的“六礼”,荀子言“修六礼,明七教”,用六礼序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七大人伦关系^②。《仪礼》一书将礼分为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纲,又以细篇叙其十七种具体节仪程式。另外还有所谓冠、昏、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等“九礼”之称^③。礼,规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祀神祭祖、社交待人、伦理公德乃至兵礼军训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这种泛礼主义,反映了春秋以来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们立身处世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转变。如果把当时社会视为“礼治社会”,虽不免有把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化,但至少能道出中国古代社会确与社会学的“法理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

再来看俗,俗的性质内涵与礼有些区别。《说文》:“俗,习也”。《释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俗教安则民不愉”,郑注:“俗谓土地所生习也。”用今天的话说,俗指民间社会初无意识的便习事象,久行乃约定俗成,复又制约社会生活的实践形式。俗有相应的自然育成条件和平民性社会生活氛围,根源于民间习惯,故有称习俗。古人有时也以“民

① 《周礼·春官·大宗伯》。

② 《荀子·大略》。又《礼记·王制》说同。

③ 《大戴礼记·本命》。

俗”相称,《礼记·缁衣》:“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管子·正世》:“料事务,察民俗”,这里讲的民俗,无非指俗必藉于一定的种族或民群,与当今学界讲的以某国或某民族传承性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民俗学”之“民俗”,概念有所不同。

气候、地理、物产等所谓“风土”因素的自然条件相异,常形成不同的俗。《礼记·下制》云:“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俗的地域性是其一大特征,但因为民便习,若无对比,常不易觉察,盖“身在庐山”之故。春秋战国的战乱和列国兼并,各地区间的交往交流空前频繁,人们视野大大打开,有可能充分展开各地习俗间的比较。《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礼记·曲礼上》说:“入国而问俗”,《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入王之境内,闻王之国俗”,《吕氏春秋·责直论》说:“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又说:“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同书《异宝》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均是当时人对习俗地区性差异所见所闻的识别。俗的地区性差异,主要因“风土”因素造成,故俗常与“风”相系,《新论·风俗篇》云:“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此即所谓“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要之,古人说的俗、习俗、民俗、风俗,是讲在一定地区范围内传承、播及于其社会族体或集约人口团群的、在相对社会历史条件下自发约定、重复习行的生活实践形式。

由此看来,礼与俗,同属社会生活的传统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讲,礼是人为理性化的产物,经有意识提倡推广,成为中国文化的纵向线和大传统;俗是社会因地制宜的生活实践产物,构成民间的横断面和小传统。作为全社会生活运作准则的礼,是以

“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①的政治内涵为要征；作为民间普通社会生活实践形式的俗，起有简化社会活动过程和调节人们行为观念的作用。礼与俗的关系，礼是俗的升格，俗是礼的底蕴；俗经理性归范，存其合理，汰其恶陋，有意模式化，可上升为维系上层社会运作和稳定下层社会的礼，同样，礼亦可对俗进行统整，随时加入俗的成分。俗是礼之源，礼是俗之流，《慎子》说：“礼从俗”^②，正有上述意义。显然，礼、俗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交叉纠葛、彼此交流、循环推进的关系。广容性、节仪化的礼，可与虽狭隘却实践性强的俗互为补苴，因势利导而返诸社会，发挥改造社会风气的功能，《礼记·曲礼上》说的“礼从宜，使从俗”，即有这层意思。俗经礼的统整，是为礼俗，“礼俗刑(型)然后乐”^③，这种经人为倡导的礼俗，返诸社会，为世俗所习，是为更生的习俗，已合两者之长和补两者之短，其社会运操功能无疑大大增强，难怪会受到古代统治者的重视。

事实上，春秋战国时各国统治者对俗的统整均有不同程度的重视，统整的手段是靠政教、公德原则和因地因民制宜的“化”，在尊重俗的大前提下用理性的礼乃至法进行“导”。如《论语·为政》说：“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墨子·节葬下》说：“上以为政，下以为俗”，《左传》庄公十三年说：“夫礼，所以整民”，《荀子·大略》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鹖冠子·天则》说：“为化不因民，不能成俗”，《礼记·昏义》说：“教顺成俗”，《曲礼上》说：“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管子·法禁》说：“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这些经验谈，反映了随着当时

① 《左传》隐公五年。

② 《太平御览》卷九二引。

③ 《礼记·大传》。

平民社会地位的上升和“民本”思想的明确，整合民俗已紧要地摆到统治者的议事日程之上，其成功与否成为考其政治得失和社会风气正邪的重要方面。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礼与俗，界限已难严格分开，“教民成礼”^①，可理解为“化民成俗”^②，无不是指习俗的时代移易及应变。礼的俗化和俗与礼交合，乃构成春秋战国习俗史上最生动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

再构春秋战国习俗史，应充分把握这一时代特征的主线，充分把握文献与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古发现，更有必要启动现代思维认识，用深沉的历史感知和认识尺度，去冷静审察中国社会早翻过的一章，调整情绪的点染，不致坠入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了解历史，设计未来，提高我们民族的素质，造就新的史识与人格，这也是本书追求的宗旨。

① 《战国策·越策》

② 《礼记·乐记》

二、人与社会

(一) 习俗的社会育成氛围

周代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在全国要冲进行武装拓殖,据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①,用来夹辅周室。“体国经野”,国城及郊地,居民为周的族众平民和胜国遗民,称做“国人”;郊外广野有邑,为“野人”所居,不外是一些古老部族的后裔、蛮夷戎狄或流裔之民。^②列国大体皆然。在文化习俗上,国人与野人有一段间距,“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③

至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启土安疆”的“领土国家”意识相继规立,定民之居,编户齐民,移风易俗,原先依文化差异和地缘种族划分国人、野人的界限逐渐消泯,“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④。如齐国管仲有“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改制,“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

① 《荀子·儒效》。

② 参见杜正胜:《周代城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30页。又赵世瑜:《周代国野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3、55页。

③ 《吕氏春秋·为欲》。

④ 《孟子·万章下》。

畴，世同居，少同遊”^①，以至“邻邑相望”，“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②。晋卿赵简子家臣尹铎又有本之户籍编民的“损户数”之举^③。楚国曾推行集中管理国土编制的“书土田”^④。后吴起变法，有“一楚国之俗”，“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⑤。越国有类似中原国家的将村社户口土地登记成册的“书社”^⑥之制。秦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社会风气为之改观，“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佻”^⑦。尽管列国的变革之势复杂多异，但启土安疆和编户齐民的制国环境，均各各为习俗深蕴提供了社会舞台，“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獯入，今被朝服”，“化不宾为齐民”^⑧，也在当时的战乱和兼并等因素推动下，成为其民族混融潮流中的各个地域文化圈形成的一大表征。

与此同时，人口的增加，是列国以郡、县、乡、里、伍、什等行政编制取代国野制的基本社会原因。城市的大量出现和城市规模的发展，又是人口增加背景下各地域文化圈的运作聚焦。

《说文》云：“城以盛民也”。《礼记·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尉繚子·兵谈》云：“量土地肥磽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当春秋之时，城邑之小者至于十家，大者亦不过千室，普通的仅百室而已^⑨。列

① 《国语·齐语》。

② 《庄子·胠篋》、《孟子·公孙丑上》。

③ 《国语·晋语二》。

④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⑤ 《战国策·秦策》、《吕氏春秋·贵卒》。

⑥ 《吕氏春秋·高义》。

⑦ 《史记·商鞅列传》、《荀子·强国》。

⑧ 《论衡·宣汉》。

⑨ 齐思和：《战国制度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